

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理论及实践

同济大学 仇华飞

内容提要：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建立和睦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规范行为的规章准则，是合理解决争端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状态。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这种规则和机制的保证。西方学者提出两种国际秩序观，一是霸权秩序观，二是均势秩序观¹，前者强调国际体系格局的霸权结构或单极结构；后者强调均势稳定的国际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国际秩序不同于西方国际秩序观，她强调制度和观念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奠定构建规则、规范的国际秩序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 中国特色 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社会的制度和价值构建，国家实力的消长是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权力基础。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大国关注秩序内机制和政治博弈的变化，机制是否有利于国家克服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在国际秩序演变进程中，大国是将实力转化为强制力还是作为构建社会共识的基础，决定国际秩序转变的方向。国际秩序分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它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²以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为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联合国的建立，从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影响半个世纪国际关系，是一种霸权秩序，呈现不公正性、不稳定性特征。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是制度和价值的构建，面对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既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又有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把握，提出一系列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促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新理念、新规则、新体制。习近平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³

当今世界，各国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星球上共生，是因为存在一个国际社会。这个社会不仅需要权力的支撑，也需要法律、制度、规则等因素，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任何国家，无论其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管理世界，治理国际社会。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⁴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的今天，更应当加强对话与合作，通过国际社会成员的协商，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来治理世界。习近平关于制度规约下的国际秩序上超越了以“极”定义格局的思维模式。

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在制度和价值构建两个维度上，背景是多极化趋势下国际关系，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为先导，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对发展中国家作出正确义利观的郑重承诺；从“一带一路”战略和行动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等，凸显国际秩序演变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中国梦”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理论构建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作者：仇华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C002）阶段性成果。

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²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2-3.

³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324 页。

⁴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274 页。

全球化、多极化迅速发展时代，人类不仅面临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且来自人类生存危机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习近平全球治理实践对中国外交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具有时代意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他强调各国要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⁵“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旨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理性协调的和谐安全观、合作共赢的正确义利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

“国际共生论”有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体的独立性、主体性与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共生性都具有体系结构性，不仅互动、联动而且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已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这种体系结构性使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直接关联起来。⁶共生理论为研究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提供重要理论借鉴。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理念。习近平有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两者都以合作为本质，以共赢为目标，都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⁷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只要各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层次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⁸

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21世纪国际秩序稳定至关重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可行性，亚洲各种共同体建设的尝试和努力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虽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但亚洲各国也曾有过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及努力，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等。长期以来，东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是“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⁹中国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动力，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建设、努力迈向“命运共同体”。这是来自古老而年轻的中国经过深思熟虑，诚心实意谋求和平发展的诉求。“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¹⁰争取稳定繁荣的周边，特别是“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都是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创造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延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¹¹同时，中国的发展，促进周边乃至世界的发展，给国际和平提供助力。¹²

“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存在逻辑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

⁵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⁶ 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国际观察》2014年01期。

⁷ 王毅：“习近平外交理念：具有高超娴熟的外交艺术”，《人民日报》2015年2月12日。

⁸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04期。

⁹ 刘宗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04期。

¹⁰ “习近平2015外交大布局：定位中国角色，推出中国方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2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5/1225/c385474-27974814.html>

¹¹ 同上注。

¹² 邱耕田：“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秩序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

2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¹³“亲诚惠容”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和文化的精华部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特色，体现中国新的国际价值观念。

“亲”强调的是亲缘纽带关系，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文缘方面的相通和亲近感；“诚”既有真诚无妄的一面，也包含诚实守信、不欺侮的意味，体现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真诚有信之态度；“惠”强调的是互惠互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容”在承认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同时，追求实现差异中的和谐共存。这四字箴言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实现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梦想。¹⁴

如何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习近平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¹⁵“亲诚惠容”理念有助于加强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力—利—义”三位一体的周边外交策略，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进行有机结合，重点是在东南亚方向实现突破。¹⁶为构建中国特色周边安全秩序提供对策建议。

“亲诚惠容”“亲”是目的，“诚”和“容”是主要手段，“惠”是基础。“惠”主要指经济方面，而“诚”和“容”主要指安全和政治方面。周边国家普遍认同“亲诚惠容”理念，这必然要求中国加大对周边的战略投入，落实这些战略和理念的调整，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¹⁷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对中国周边外交及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为中国大国外交提供实践经验。

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视角分析“亲诚惠容”理念，这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理念新的解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心，提出的中国进行外交活动的标尺。中国将周边国家视为亲密邻居、亲密朋友，强调以诚待人，以诚为本，以诚立身；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不仅要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也注重对方的利益和诉求，使中国的发展造福周边，共享发展福利；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包容不同意见和诉求，在对待彼此之间的争端时宽容以待，展现海纳百川的气度。¹⁸“亲诚惠容”理念体现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基本内涵。

3 新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¹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习近平主席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提出发展是最大安全的思想。²⁰“作为本地

¹³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297 页。

¹⁴ 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

¹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297-298 页。

¹⁶ 卢光盛、许利平：“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及其实践”，《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4 期。

¹⁷ 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道德政策调整与新理念”《当代亚太》2014 年第 3 期。

¹⁸ 孙云飞：“中国周边外交调整的预期目标与大国反应——兼论中国周边外交调整的突破口”，《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 年第 4 期。

¹⁹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354 页。

²⁰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356 页。

区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已经堪称本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如果安全就是发展，中国也就是亚洲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像早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新安全观’将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普遍原则”。²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科恩（David Cohen）分析说，“威胁中国和本地区安全的不是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是对安全的‘旧的’或‘零和’理解，这种理解鼓励中国的邻国关注这些争端而不是经济增长与一体化的积极事业。根据这种框架，日本和美国的确是亚洲安全的威胁。它们将领土争端看作中心问题，向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它们鼓励这些国家挑战中国，而不是关注中国崛起的积极方面”。²²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东盟国家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关，由于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²³新安全观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关系走出安全困境，寻求构建促使中国-东盟安全与合作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有效机制。

新安全观思想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传统亚欧大陆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存在“张力”的历史，不再主导欧亚区域间的地缘政治安排。新安全观深入到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层面，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环境、能源、粮食、反恐等各个议题领域。在水平的维度上，安全治理需要借助多边的和多层次的国际制度实现全球联动，从而达到合作治理的目的。中欧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有亚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这些跨区域治理组织和制度的存在证明了并非只有通过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相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联盟才能用权威的手段处理全球性问题，不同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国际机制来应对全球性问题。²⁴从国际问题研究的不同维度，阐明新安全观对维护当代国际秩序稳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未来中欧关系的重要影响。

如何创建有利的地区和周边安全环境，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新的安全观念和战略。新安全观涉及以下领域：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安全与发展：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与金砖国家合作；“新丝路”建设中的安全合作；挑战与应对；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周边安全六大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以及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及总体安全观的意义。²⁵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亚洲各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从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二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实践

1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多极化时代人类面临各种挑战，各国需要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协调和合作，尤其要加快建立全球治理机制。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阐述中国参

²¹ David Cohen, "A Clash of Security Concept": China's Effort to Redefine Security,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Vol. XIV, Issue 11, June 4, 2014, pp.1-3.

²² *Ibid.*, p.3.

²³ 张哲馨：“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

²⁴ 任琳：“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德国研究》2015年第1期。

²⁵ 张蕴岭、袁正清：《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与全球治理,强调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利用多边机制和国际舞台来寻求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全球治理战略,这是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新拓展,适应了中国发展的新形势需要。²⁶习近平全球治理的战略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政治领域,习近平强调,坚持平等民主、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²⁷深化发展中国家间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习近平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²⁸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²⁹

经济领域,习近平主张,以创新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巩固金砖国家在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³⁰他敦促金砖国家要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加快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携手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³¹为亚太地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³²

外交与安全领域,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以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³³推进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加强务实合作促进共赢。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强调,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是核能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³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国际格局的良性构

²⁶ “中国‘十三五’力增全球治理话语权” 香港《大公报》2015年11月3日。

²⁷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323页。

²⁸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²⁹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³⁰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

³¹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网2015年7月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08/c_1115861505.htm

³²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330页。

³³ “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布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9月19日。

³⁴ “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4月3日。

建和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

关于国际机制创新，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³⁵

2 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重要实践。当代世界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一是世界变得越来越极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方面的多极化，而且是发展模式走向多极化。二是新兴国家地位上升；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展现国际领导力方面正提出新的全球价值。三是非传统安全对当代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性正在大大的提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权力转变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内涵。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不少人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最重要的特征是霸权国缺少一个重要的战略对手及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平衡（competitive balance）。³⁶这是冷战思维定式，“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对这种思维定式的否定。“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利于推动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³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习近平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³⁸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是避免美中两国发生冲突，两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美国和中国需要共同承担这个任务。以一方作出所有妥协或单独承认其路线的错误为前提的建议不会取得成功”。³⁹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制定一项新的方针，以避免老牌强国和新型强国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两个世界性大国为 21 世纪建立的新的生存方式共同构建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建设性和相当稳定的双边关系。作者在书中强调建立新的生存方式是大国共处的必要性，中美交往必须适应国际秩序变化这一现实，以合作共赢引领两国关系的发展。

40

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同当年的英德、日美冲突相比，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纵深发展时代，大国之间承受不起发生严重冲突或对立的代价；同美苏关系相比，当今中美之间利益深度交织，只得以超越冷战的思维去加以经营⁴¹。习近平借鉴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针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他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⁴²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传统大国关系理论的批

³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4 日。

³⁶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199.

³⁷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3 期。

³⁸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第 279 页。

³⁹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China-U.S. focus*, Hong Kong, September 21, 2013.

⁴⁰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3-4.

⁴¹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5 期。

⁴² “习近平在西雅图就中美关系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3 日。

判和扬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首先实现和维持战略稳定,因为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建立在战略稳定上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相互尊重,并寻求互利共赢。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在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高层议程中,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⁴³在当今国际秩序演变环境下,坚持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各种挑战的重要保证。

中美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两国政府来说都至关重要。美国学者保罗·曼奇内利(Paul Mancinelli)指出:中美都承认,两国关系不稳定可能导致冲突,而“新型大国关系”(NTGPR)意在避免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美国采纳 NTGPR 比冲突更可取,因为美国采纳 NTGPR 可以纠正中美之间的矛盾,因为美国喜欢单边主义,而中国的战略是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对中国来说,美国接受 NTGPR 就表示美国有望接受这种关系下的原则,并接受有必要避免冲突的看法。⁴⁴具体措施有,首先,美中需要加倍努力谈判减少海上风险的措施。其次,美中需要遏制核扩散威胁。第三,美中应巩固战略对话,找到限制战略竞争的新途径,包括在网络空间或外层空间领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第一,中美对国际责任的看法不同;第二,双方自我认知不同,第三,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问题;第四,两国军力不平衡。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安全框架,为解决最严重的人类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对美国、中国以及有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来说,答案必须包括推行新的领导形式、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以共同安全为国家安全的检验标准。⁴⁵上述四个障碍考验中美两国领导人解决矛盾和对立的政治智慧,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挑战的严峻现实。

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走向,从大国外交实践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在朝核、伊核、阿富汗、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中美在推动确立核安全制度建设,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积极成果,推进国际体系建设和改革中正在起积极作用。尤其是2016年4月第四届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表明中美通过平等对话增进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理解与沟通,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核安全合作成为中美关系新亮点。⁴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⁴⁷中美核安全交流和合作已成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一带一路” 战略与行动

“一带一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为了使中国和欧亚非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且提出合作的具体措施——“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⁴⁸关于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他强调四个“共”,即: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⁴⁹“一带一路”首要的任务是打通亚洲腹地和加强海上联系来推动亚洲一体化。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借鉴当今区域一体化

⁴³ 达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⁴⁴ Paul Mancinelli, “Conceptualizing ‘New-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ino-Russian Model, *China Brief* Volume: 14 Issue 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7, 2014, pp.12-16.

⁴⁵ Melvin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52, No.1, Dec. 30, 2013.

⁴⁶ “核安全合作, 中美关系新亮点”《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

⁴⁷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

⁴⁸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289-290页。

⁴⁹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

模式,积极探索符合亚洲实际、有利于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合作模式。因为无论“一带一路”是作为中国崛起的引擎,还是作为亚洲腾飞的翅膀,都需依靠沿线各国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才能真正推动亚洲一体化迈向深入。这就需要一种使亚洲国家愿意参与、能够参与的一体化制度平台。具体措施包括:互联互通概念包含亚洲一体化的各项元素,从构建亚洲新型区域合作模式高度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搭建具有亚洲特色的一体化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亚洲一体化和共同繁荣,既是“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将是中国对亚洲政治经济格局重要的重塑。⁵⁰ 研究亚洲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功能、制度平台功能,对深入探讨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和行动具有重要价值。

透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从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入手,深刻认识该战略的重要性。为确保“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中国需遵循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重构逻辑:一是要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二要识别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三是决定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其核心利益。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定位和核心利益;厘清“一带一路”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关系;评估“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诠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体制改革的关系;处理好“一带一路”建设中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重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⁵¹为推进建立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提供战略保证。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行动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还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国际秩序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作为中国战略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既面临着全方位开放机遇、周边外交机遇、地区合作机遇、全球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道德风险。它既超越古代,又超越近代,一是体现理念革新:共商、共建、共享;二是理论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三是方式崭新:尤其是提出“五体”——文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的主旋律。⁵²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新的压力,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将从不同方面分别检验中国与美国的国家能力。中国如果处理得好,有可能把“美国的亚太”转化为“中国的周边”。而如果处理不好,“一带一路”战略或成为“中国的麻烦,美国的机会”。但是,“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转变为“综合性的世界大国”的一种尝试、一种路径。中国没有更好选择,只能直面应对,并争取最好的结局。⁵³在推进进程中,要逐步分析“一带一路”的制定思路、核心内涵、实现方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最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大战略,对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⁵⁴根据国际合作机制理论,利益相关各国可签订实证性协议(substantive agreements)以实现短期利益回报,也可以签订制度性协议(institutional agreements),实现长期效益。⁵⁵作为“一带一路”的创始国,中国欢迎各国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合作项目的建立就是“一带一路”带给各国的战略性红利。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涵,它为共建繁荣亚洲的良好愿景注

⁵⁰ 王玉主:《“一带一路”:与亚洲一体化模式的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⁵¹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0 期。

⁵²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⁵³ 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

⁵⁴ 金立群、林毅夫:《“一带一路”引领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

⁵⁵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119.

入强劲动力。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加快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已经敲定,中老、中泰铁路开工在即,中越铁路线路正在加紧规划,各国期待已久的泛亚铁路网建设终于迈开步伐。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合作,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图进一步明晰,一大批重要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⁵⁶除了“一带一路”战略和行动外,中国还在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推动中国与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等方面全面展开,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的战略已经初见成效。

三 结束语

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正义的思想;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与时俱进的时代观;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分析方法运用到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秩序外交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凸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这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是“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思想的典范,是弘扬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伟大实践。体现五个特征,一是关联性,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各种事物视为关联性的存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有机联系。二是动态性,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观念和政策创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倡议体现了习近平与时俱进的外交战略思维,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三是互补性,习近平提出,要积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互鉴,“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是中国传统文明与世界文明互补的体现。四是和合性,既要求同存异,也要聚同化异。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思想,新安全观等。五是整体性:树立世界眼光,认清和把握长期趋势。从整体而非局部来把握事物的性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是中国哲学文化的显著特点。

习近平有关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借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途径;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权力、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思想的有力批判。同时,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也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某些积极要素,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重制度、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规则,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⁵⁶ “大格局 大手笔 大胸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覆盖述评”,《人民日报》2016年1月26日。